

一、信仰教育研究.....1

1. 概念性研究

信仰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社会和精神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信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也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信仰对学生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及思想修养的形成与建构有聚合与提升的作用,开展信仰教育,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德育的实效……

2. 问题性研究

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信仰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神学和宗教上,其拥有丰富的信仰教育实践和信仰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西方世界最早信仰神学,神学将信仰置于一切之上,视信仰为最高的美德,这也使得西方国家的信仰教育多带有浓重的宗教主义色彩……

3. 对策性研究

当前高校大学生信仰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循着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信仰教育全过程参与者的视角,探析如何提升高校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有效性对策,满足大学生对于科学信仰的需求……

二、文化认同研究.....9

1. 概念性研究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其核心是对—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

2. 问题性研究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校公民教育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以及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从西方国家传来并逐渐被国人了解和熟悉,这使得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规范、思想观念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使得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3. 对策性研究

针对文化认同感缺失的表现,我们在此提出—个概括性思路,即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为指导理念……

三、媒体文章刊摘.....16

- 1. 强势文化力保主流地位 弱势文化强调自我认同
- 2. 文化认同是增强爱国意识的基础和条件
- 3.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谈文化?

四、专家学者观点.....21

- 1. 葛兆光:呈现中国:什么是“中国”风格?——葛兆光教授在上海文化论坛上的讲演
- 2. 葛剑雄:中国人的信仰
- 3.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信仰教育研究】

编者按：高尔基说：“智慧是用来做事的，对于灵魂来说，靠的是信仰。”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组织，是未来社会建设的推动和承担者，也是文化水平高、思想活跃、富有朝气的新生社会组织。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渴求知识、乐观向上，把个人的理想抱负同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在一起。同时学生时代也是信仰建立发展和迈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信仰问题关系到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大学生们的政治信仰的走向，也维系着我国社会的稳定，关乎到共产主义理想的传承及实现。

一、概念性研究

1. 信仰

信仰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社会和精神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信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也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信仰是人的行动指南，而行动则是受思想支配表现于外的活动。一个人的行为从根本上来看往往是受信仰支配的行动，人的信仰则是其行为的基础。信仰在心理上表现为对某种事物的仰慕和向往，在行动上则表现为以某种思想体系为准则去解释和改造世界。信仰问题的研究，需要考察具体信仰现象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即通过人类活动的角度来考察信仰问题，在不同的阶层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于信仰都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定义和诠释。伦理学将信仰定义为“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能动的把握，是对人生最高价值和社会最高理想的反映、评价和把握，是一种动态的运作过程，这种运作过程构成的人类信仰活动是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一种文化价值活动。”哲学上则认为信仰的本质是人的自我超越性，因而信仰表现着人类的终极关怀，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事物或思想、主义极度尊崇和信服，并把它奉为已的精神寄托和行为规则，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鉴于各学科信仰定义的共性特点，信仰是人们在实际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于某种理论、价值、意识创造出的人格化的对象等极度的信服，并将其设定为身的精神的寄托或作为一种终极价值追求来坚守的思想行为活动。

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信仰是人们对已认定为最高价值的思想、认知、情感、对于真、善、美和无限由境界的向往和执着追求；从信仰的根源上看，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现实背景，既来源于实践生活，又高于实践生活，并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同时信仰又是对于现实的一种超越，对理想的一种追求。总之，信仰是人类所独有的心理现象，是人们对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信奉和遵循，也是统摄其他一切意识形式的一种最高意识形式。**信仰具有社会性、统摄性、超越性特征。信仰具有个体导向功能、凝聚功能、价值评价功能。**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SoftPower)概念，他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和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有的学者提出“信仰力”这一概念，信仰力即民众对信仰所拥有的广度与深度。他们认为，信仰力是国家软实力的灵魂。他们指出信仰力可以唤醒民众的觉力，激发生命力；信仰力能够增强文化的信力，开发创造力；信仰力能振奋民族的强力，达成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至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甚至是全人类，都是必不可少的。信仰与民族、国家、人类，是不可分割的，信仰是必然要存在人类涉及的社会环境中的。

2. 信仰教育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信仰对学生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及思想修养的形成与建构有聚合与提升的作用，开展信仰教育，对信仰教育做一个相应的探讨，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德育的实效。

信仰教育自古就一直存在于人类现实社会中，它是人类教育活动中一个特殊的领域，

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信仰教育是指一定社会和阶级对特定的教育对象进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引导过程。教育者按照一定阶级、集团的意志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使之树立符合特定阶级、集团需要的信仰的教育活动。不同的理想、信念、信仰其作用是不同的。信仰教育与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各类教育有所不同，知识教育负责人类知识的传授，旨在提高受教育者的智力。而信仰教育则负责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旨在提高受教育者的觉悟。信仰教育是针对特定的社会成员进行某种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的教育活动。

信仰教育是要充分发挥信仰对人的导向功能，是要人的精神活动从现实导向未来，使他们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追求生命的完善，追求人类的和谐。通过信仰教育，目的是使人确立科学的理想、信念、信仰，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信仰教育由信仰内容、信仰活动、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手段等重要元素组成，就信仰内容来看，历史上，人类的信仰教育是多种多样的，如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教育，中国古代的儒学关于政治信仰、道德信仰教育，资产阶级关于由民主理念信仰的教育，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信仰教育等。由此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国家，信仰教育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为了实现或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3. 中西文化对于信仰的理解。

从中国的信仰概念“诚”字的涵义上，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对信仰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西方文化对信仰的理解更侧重于信仰的对象，而中国文化对信仰的理解则更侧重于信仰的主体，即信仰主体的精神境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谈论信仰时，总是强调它是对某种对象的相信和执著，离开了明确的信仰对象就无从理解信仰。而且各种不同信仰之间的区别也主要地是各种信仰对象之间的区别。而中国文化中所说的信仰侧重于信仰主体的态度。中国古人看重的是人们真诚信仰的态度本身，而至于信奉的究竟是什么对象则不予重视。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不论是信仰孔子还是信仰老子，不论是信仰佛陀还是安拉，都是同样真诚和有价值的信仰，都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中国古代的一些士大夫往往同时真诚地信仰好几种宗教或理论。与此相反，西方人却总是认为只有对某一种信仰对象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而对其它对象的信仰都是虚妄的。

其次，在西方文化中，信仰发展的极至是对一元的信仰对象(上帝)的信仰；而在中国文化中，信仰发展的极至是对信仰对象的超越和扬弃。在中国古人看来，执著于某种对象的信仰并不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精神境界总是与对特定信仰对象的超越和扬弃联系在一起。因此，信仰的极至是无明确对象的纯粹的真诚态度，可以说它超越了明确的一元性信仰对象。

最后，在西方文化中，信仰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它超越了一切感性的和理性的认识，超越了理解和领悟。但西方人当作最高精神境界的“信仰”，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而只是到达最高境界的一个中间性阶段。在《论语》中，孔子认为能做到“信”并不算很高的境界。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家道生认为佛教信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第二个阶段是“悟”，“信”是不真实的，没有达到对佛的体悟，从“信”进到“悟”才是达到了佛教信仰的最高境界，而达到了“悟”以后，“信”也就消失告退了，这就是“悟发信谢”。在《中庸》中，“择善而固执”是比较低级的境界，是针对大多数人的要求，它是一种执著的态度，还没有达到消除执著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境界。

由此也可以得知，中国文化中“信仰”理论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文化看来，信仰并不是一种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而是心情涵养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其最终的追求就是要扬弃和超越信仰的执著和固执态度，达到一种与天道合一的神游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最终消解了一切外部的信仰对象和对这些对象的执著态度，从而达到一种纯然澄明的精神至境。可见，在中国文化中包含有信仰的消解因素，它不断地使信仰归于消解，从而排除了信仰问题在文化研究中的突出位置。

4. 信仰教育对于高校大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性

(1) 信仰教育开展的现实环境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纵观国内外，国际上，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全球化趋势不断推进；国内社会正在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受到平庸，甚至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影响，人们精神世界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问题。特别是当代高校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还缺乏成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容易受到思想污染，做出错误的信仰选择。因此，加强信仰教育，特别是大学生的信仰教育，有利于我们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利于我们赢得未来。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世界全球化趋势必然导致“愿意走的跟着全球化的步伐走，不愿走的被全球化托着走。毕竟，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更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和客观要求。”当前，面向世界培养本国、本民族，甚至全球所需要的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胸襟，拥有世界性的知识、理念、思维的素质人才，已经成为各国教育的重要目标。培养国际意识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主题。**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必然要求大学生信仰教育也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

当代大学生多数出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当时正值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已经显现出明显成效，同时也是中国信息飞速发展的年代。所以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无疑对他们的信仰形成造成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推动了思想观念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各种文化价值观、制度和思想相互交织、碰撞，促成了信仰形式的多元化。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伴随改革开放涌入国内，发达经济产生的吸引力也成为思想意识传播的优势，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也逐渐成为党和管家关注的重点。科学理性的信仰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教育才能得以实现的。信仰教育是教育活动中的一个部分，也是一种具体的教育内容，它与技能的培养和知识的传授是有区别的，它主要指一定的社会、阶级、组织集团把已确立的信仰通过教育影响，传播给受教育者的一种实践活动，在当前，**信仰教育的核心内容依然是政治信仰的教育，即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这当中还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科学精神教育和国情教育等相关内容**，信仰教育的目的是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人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信仰教育问题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样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2) 信仰教育对于高校学生成长发展的作用

罗曼·罗兰说过：“整个人生是一幕信仰之剧。没有信仰，生命顿时就毁灭了。”科学的信仰为人生实践提供动力和毅力，是人生的力量源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为大学生追求事业、奋发成才、奉献社会提供经久不衰的前进动力。科学的信仰具有支撑作用。它是人生的一种精神支柱，能为人提供一个希望，这种希望在人生处于困难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而崭新的事业，诸多方面都是前无古人的未知领域，科学的信仰将使大学生具有科学的胆识和大无畏的勇气，向着奋斗目标不断前进。总之，**信仰教育是大学生锻炼成才，担当历史重任的必要条件。**

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社会组织，又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使命，更是将来社会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大学生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并影响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在大学生中树立怎样的信仰，关系着社会发展的走向，大学生信仰教育程度的高低、质量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纵观世界多数国家，**爱国主义始终处在信仰教育的核心地位而不能动摇**。信仰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信仰教育也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信仰教育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进而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加强大学生信仰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步骤。信仰是人生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精神需要，也是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目标的向导，更是衡量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准，拥有科学理性的信仰才能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支撑着自己永远向着前方不懈努力，而信仰同样是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所在，树立和拥有正确的信仰，方能增强个人对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自觉约束身的行为，实现大学生身综合素质

质的提高。契合现实面临的严峻环境，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体系的信仰教育如何能够确保学生组织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坚持，需要依托传统的灌输方式的同时，开拓视野，与时俱进，选择和开发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都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造成人们对于信仰困惑，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思想意识领域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缺失。特别是当代大学生正处在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一定程度上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侵蚀，形成错误的信仰观，因此加强信仰教育，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利于巩固马克思助于信仰的主导地位也利于学生大学生形成和树立正确的科学信仰。

二、问题性研究

国外有关信仰教育的研究动态

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信仰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神学和宗教上，其拥有丰富的信仰教育实践和信仰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西方世界最早信仰神学，神学将信仰置于一切之上，视信仰为最高的美德，这也使得西方国家的信仰教育多带有浓重的宗教主义色彩。宗教信仰在西方国家盛行，在一些国家中人们大多数信奉宗教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宗教徒，多数人会选择从宗教信仰里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即便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都会遵循所信奉的宗教思想和原则，因此宗教信仰构成了西方国家信仰教育的主要内容。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对于国民进行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国民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一些国家虽然在学校教育中没有专门设立德育课程，但信仰教育和道德教育却以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方式在各学校中施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美国在道德教育活动中非常关注信仰教育，社会、学校、家庭都把信仰教育工作当作应尽的职责。美国的信仰教育过程也非常注意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并且讲求教育的艺术性。在美国，信仰教育不只是通过简单地用灌输手段来实现其教育目的，教育过程都具有互动性双向性的特点，能够使教育产生内化效应使受教育者更好的理解和接受信仰。此外美国在信仰教育方面注重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贯性。

西方信仰教育着眼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宗教在高等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国家对于信仰教育的研究主要特点着眼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上。

韩国近年来针对学生厌学、精神空虚、犯罪率上升的状况也改进了德育内容和方法，加强了对学生的国民精神的系统性教育，调整了培养目标，加大了信仰教育的力度

澳大利亚政府从公民学角度把公民教育定义为旨在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发展学生的技能，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使学生作为积极的有见识的公民。

日本出大力宣传民族精神和共同信仰教育外，充分发挥社区机构在思想教育中的作用是一大特色。港台、新加坡等地用儒家文化思想进行信仰教育。

西方信仰教育注重研究高校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状况及其影响。宗教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被西方民众所公认的。80年代中期，美国当时的教育部长威廉·本涅特指出，如果学生们不理解宗教信仰在美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就不能掌握美国的政治和道德文化。2006年，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院的一个专门调查“全美大学生如何让追寻人生意义和目的”的课题组，调查访问了全美46所大学的3680位大学生。调查发现，上大学前经常上教堂的大学生占52%，但上大学后还继续上教堂的大学生比例下降到29%，其变化可谓不小。有些神学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信仰危机，因为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学生学生们反而淡漠了信仰。这项调查第一次显示出大学生不再上教堂的具体比例，证实了许多高中生上大学后的确不再上教堂，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放弃了信仰。调查发现，虽然上教堂的大学生减少，但77%的大学生仍会作祈祷，71%的大学生认为宗教对他们有帮助，73%的大学生认为宗教和信仰能帮助他们发展我人格，58%的学生认为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虽然上大学后继续上教堂的大学生人数减少，但是相对来说美国大学生的宗教信仰仍然在其德育教育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李修远. 我国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问题研究[D]. 西安科技大学, 2013.

当代大学生的信仰问题

中外学术界对信仰内涵的探讨路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不相同，那么对“信仰问题”的界定也是意见相左的。本文从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两个角度来对“信仰问题”的含义作一个浅显的探讨。信仰问题可能是社会个体的一种人生现象，或者又可能是由许许多多的社会个体组成的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现象。

1. 从人生角度来看，信仰问题是一种人生中的现象。信仰问题可能由一个人特殊的生活境遇和人生道路所引起，也可能由于整个社会或时代的大气候所引起的。在所有的社会和时期中，即使是在社会大统一，民众大团结的时期，由于社会或者个体的特殊性，也会出现个别社会个体的信仰问题。比如个人在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中遇到的困难，人际关系的和不和谐，社会的不公正，都可能导致信仰问题。另外，在社会历史条件出现变动或者转折的情况下，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相对性，也会因为其来不及调整而出现短暂的滞后情况，在社会一定范围内，社会个体遇到人生信仰问题，就很正常了。

2. 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信仰问题是一个社会组织（国家、民族、阶级等）的主导信仰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它具有历史性，往往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信仰问题，表现许许多多的社会个体的人生信仰问题。从历史上看，人类信仰动荡，往往伴随社会某种大变动或大转折，原有的信仰在新的现实的情况下，会出现某些危机。经过一定的动荡时期，之前社会的主流信仰逐渐衰落，新生信仰地位慢慢上升；或者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一种久经年代考验的信仰体系会经过数次锤炼而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为，信仰问题就是信仰保持的不坚定或者失败。此外，信仰问题也包括很多方面，如信仰什么的问题，即信仰对象选择问题；如何信仰的问题，即信仰方式问题等等。

——般桂清. 当代大学生的信仰及信仰教育问题探究[D].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关于我国高校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调查

第一则调查是在2006年，有一个对北京地区大学生的关于信仰的调查，该项调查显示，北京地区的大学生信仰现状总体上是健康的、进步的。在调查中，八成多的大学生认为应该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信仰理解方面，该调查指出，大部分学生认为，信仰在身的成长是非常必要的，认为“有了信仰人们就会为其努力进取”。在调查问卷的多项选择部分中，选择“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拥护社会主义，为社会做贡献”的占大多数；同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不应该完全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应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占85.76%。同时，65.18%的同学赞成“贡献多好处多”，有27.5%的学生认为“私是人的本性；在回答“您的信仰”时，有40.88%的学生填写了“个人奋斗”；在对人生的看法上，有65.18%的人认为“多贡献，多得利”；但也有27.5%的学生认为“私是人的本性”；有13.4%的学生认为“什么社会理想也不要，光为吃饭问题奋斗”。

——申剑丽. 大学生信仰调研. 《新京报》. 2006.

第二则调查是2011年，有关学者对中东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两个地带的20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做了一个更为直接的有关“信仰问题”的调查。调查显示，认为已拥有信仰的大学生占调查人数的36.49%，认为已没有信仰的占调查人数的48.57%，不清楚己有无信仰的占调查人数的14.94%，很大一部分大学生没有稳定的信仰，有些大学生对信仰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在对大学生是否应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的调查中，17.19%的人赞成，58.28%的人比较赞成；24.93%的大学生认为己的信仰发生过改变，75.07%的大学生认为己的信仰没有发生过改变。在“信仰发生改变的原因”调查中，31.84%的人“认为原来的信仰不符合外部环境的变化”，32.90%的人“发现原来的信仰和己的观念不符合”，16.63%的人是“受到他人影响”，尤其是受到影视作品人物、歌星、影星的影响最为突出，可见，在肯定当代学生信仰的主流姿态后，我们还需注意大学生信仰的波动性，培养其信仰向积极方向发展；在调查入党动机时，71.46%的大学生认为是“理想和信念的追求”，14.37%的大学生认为

“谋求仕途发展”，11.99%的大学生认为“为找工作创造条件”，0.67%的人认为“有面子”，1.33%的人认为“家长的要求或他人的建议”；这说明，大部分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入党的目的，但是仍有部分同学把加入共产党看作是己追名逐利的途径之一，功利倾向较为明显。对“信仰的来源渠道”的调查显示，36.25%的学生认为“信仰主要来自家庭教育”，24.36%的学生认为“信仰主要来自学校教育”，14.65%的学生认为“信仰主要来自社会舆论”，12.51%的学生认为“信仰主要来自网络媒介”，12.23%的学生认为“信仰主要来自其他途径”，可见，大学生信仰的主要来源渠道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另外，社会舆论和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信仰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刘营军、贾水库.当代大学生信仰问题调查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

三、对策性研究

高校大学生信仰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实际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教育者对当代学生的思想特点把握的不够充分，开展的教育和活动大多无特色、少情感，教育形式也过分流于形式，缺乏内涵。而在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上严重欠缺，在触及到个人生存发展的一些现实性问题，如人际交往、学习、成才、就业等问题上，虽然高校都加强了这些课程的建设，但学生也只是了解了皮毛，在涉及到道德标准、价值标准等理性层面的问题以及涉及深层次的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触及的更加少。因此，大学生在信仰教育内容上，常常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往返徘徊，难以显示出教育的实际效果来。

1. 方法陈旧缺乏多样性

目前大学生信仰教育仍然是以传统的理论灌输为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比较单一陈旧，缺乏多样性。虽然说在信仰教育中理论灌输是必要的，但如果仍是一味地将理论知识强加于个性独立的大学生，其效果必定是不能尽人意的。信仰教育之所以很难走进大学生的心灵深处，是因为部分教师不能适应新形势，授课水平不高、授课内容枯燥，不能与时俱进，为了应付教学任务，对理论观点的讲述没有联系实际，无实际内容，不能将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使学生知道其所以然，更没有带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通过实践环节让学生有一个切深的体验，所以导致部分学生死记硬背，临时抱佛脚，抱着60分万岁的态度来应付考试。教育工作者尤其要加强信息的获取，知识的更新，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来与学生交流沟通，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大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教育者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方法，方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 渠道单一缺乏选择性

目前我国高校的信仰教育思想政治课为主，但在调查中发现，学生对这些理论的掌握并不理想，大多数学生认为，这些内容的理论性太强，无法与实际建立联系，理解起来比较吃力。而且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当中对于人生修养和人生指导的内容比较少，学生往往是学了几年的政治课后对己的人生并没有合理的规划，起不到信仰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已经引起了高校管理者和教师们的广泛关注，作为信仰教育主阵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它的教育方法、教育手段不断得到改进，理论教师队伍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在信仰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问题上我国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步。正如上面对大学生信仰危机的分析，一些大学生在信仰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固然是很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教育上的不足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内容单调缺乏层次性

在传统的信仰教育内容与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适应。传统的信仰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了政治信仰、道德信仰、法律信仰的教育，对大学生的人生信仰、职业信仰较少关注。而在政治信仰与道德信仰的教育中，大多属于喊口号，虽然一些选择，如通过开设选修课、开设理论实践课等方式来进行，然而现在的教育一般都是根据多年的惯例或是上级的文件规定来安排上课，内容的安排上没有创新，表现出很大的主观性。

文化强国视域下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

1. 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对于大学生的信仰教育而言,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尊重学生,关心学生为基本的出发点,为学生构建良好的精神家园。人的思想、观点和立场的是信仰教育解决的相关问题,所以要遵循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教育方法上也要特别注意以关心人和尊重人为原则。“以人为本”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相一致的,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使人类获得彻底的解放。大学生的信仰教学同样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从师在教学中担当的是引导与组织的作用,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教学中,教师和学生要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交流,以合作、对话的方式与学生进行密切的沟通,并把所学的信仰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这些就促使学生主动地去接受知识,加强大学生的身的修养,增强他们的自我教育意识,逐渐把信仰的学习变成一项需求。首先,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被教师调动起来。教师在教学前要精心组织教学,用新颖的方式创设巧妙的情景和学习氛围,把学生带入到信仰的学习中来。其次,教育要做到根据不同学习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让教学变得更为高效。再次,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这就需要让他们认识到信仰对一个人的重要作用,对己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追求。最后,教师发挥己的示范作用,严格地要求己,达到学生心目中的信仰模范的标准。以上这些标准都是作为一名名师必须达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对学生进行信仰教育的过程也是教师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

2. 发挥校园文化教育功能

信仰教育不只是理论方面的传授,还要给学生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让他有机会把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首先,高校必须加强形象建设,塑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这主要包括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良好的学风以及制度建设等内容。教师的形象对大学生的感染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教师的各项素质都很高,学生就会以自己的老师为榜样,努力提高自己的各项素质;良好的学风会让全校都形成团结向上,勤学好读的学习氛围,同样也有利于大学生信仰的建设;高校工作的规范、公平靠制度建设,规范化及公平化也对整个社会来说都会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其次,高校应将文化的传播与继承作为重点,发挥高校校园的文化功能。对于高校来说,培养高品位的学术型人才是其主要功能,所以高校要利于然所拥有的学术资源优势,更多的组织多元性的文化活动,积极发扬和宣传道德文化,更快更好的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3. 建立信仰教育实践基地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为了实现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建立信仰教育实践基地是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要加强大学生的信仰教育,就必须增加大学生与社会的接触,为他们进行社会实践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高校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教育要求创建信仰教育基地,让他们有机会去接触社会。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们只是为了考试而进行死记硬背,对理论知识的了解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政治课的教学方式都是填鸭式教学,部分同学对政治课已经产生了厌倦感,学生的这一思想动态迫使教育者们要加强教育教学改革,通过建立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教学来进行解决。比如,组织学生到部队去观看部队军人生活与训练生活,体验部队的纪律精明、信仰坚定和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还可以与军人多交流,了解军人们对信仰的认识,从中体会到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才是人生的价值真正实现;可以组织学生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活动,通过信仰教育、情境体验、角色模拟等形式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感,增强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增强信心和决心;还可以组织大学生到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接受党性教育,通过参观学习,进一步接受党性教育,深刻领会开拓奋进、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发展,并依托不同的教学情境,将信仰教育实践基地作为新的教学场所,让学生在实践当中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让大学生在实践当中得到思想的渗透和心灵的深化。

4. 开辟信仰教育网络平台

众所周知，网络是一种当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使用工具，但是它也具有两面性。虽然它把大量的信息都呈现给大学生，让一部分大学生难辨真伪，但只要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信仰教育工具。利用网络的便捷性和超时空性，各高校可以创建网络信仰教育平台。首先，创建信仰教育网站。根据本校大学生的情况，在网站上安排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并号召大学生去浏览和学习；还可以在网站上举办互动活动，开设专栏，吸引大学生参与其中并受益。其次，教师可以利用QQ、微博、微信等交流工具与学生进行交流，为学生随时提供帮助，并组织学生利用QQ群等进行交流和讨论，增强大学生对信仰的认识。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网络可以让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得到扩充，除了与本校的老师和同学交流外，他们还可以与其它学校的师生进行沟通与交流，相互帮助，从而提高信仰教育的质量。

——宋庆垒.文化强国视域下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2014.

【文化认同研究】

编者按：“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软实力”。

一、概念性研究

1. 文化

文化的定义大致被国内外学者分为六类：

(1) 以人类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描述性定义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2) 以语言学家萨皮尔为代表的历史性定义认为，文化被民族学家和文化史学家用来表达在人类生活中任何通过社会遗传下来的东西，这些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3) 以人类学家威斯勒为代表的规范性定义认为，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被称作文化，它包括所有标准化的社会传统行为。

(4) 以社会学家萨姆纳为代表的心理性定义认为，人类为适应他们的生活环境所做出的调整行为的总和就是文化。

(5) 以社会学家奥格本为代表的结构性定义认为，—个文化包括各种发明或文化特性，这些发明和特性彼此之间含有不同程度的相互关系，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个完整的体系。围绕满足人类基本需要而形成的物质和非物质特性使我们有了我们的社会制度，而这些制度就是文化的核心。—个文化的结构互相连结形成了每个社会独特的模式。

(6) 以福尔瑟姆为代表的遗传性定义认为文化不是人类身或天生的才能，而是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产品的总和，它包括工具、符号、大多数组织机构、共同的活动、态度和信仰。文化既包括物质产品，又包括非物质产品，它是指我们称之为—人造的，并带有相对长久特性的一切事物。这些事物是从—代传给下一代，而不是每一代人己获得的。

在这些定义中，学者们对文化的认识涉及了：(1)人们的全部生活模式；(2)个人从自己和其他组织中所获得的社会遗产；(3)思想感情、信仰的方式；(4)积累起来的学问知识；(5)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6)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标准；(7)行为方式；(8)历史的沉淀等等。简言之，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2.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文化的接受、认可和自觉实践的过程。人们通过对外部文化的认同使外部世界内化为自身的本质力量，提高人的本质力量。同时，人根据所认同的文化用于指导身实践，又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人按照所认同的文化建立起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等整个精神体系，人的精神体系建立之后又会通过生产生活实践不断地改变外部世界的文化。文化认同就是在这种不断地内化和外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的。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

总之，“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软实力”。

3. 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

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模式,各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人们创造文化的物质成果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人们的习俗、观念、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活动方式上。各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使人们不能达到相互的理解,所以也就造成了文化的冲突。

(1) 思维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

思维方式是指人们的行为习惯或思维的程序,它是受不同文化、个人知识结构、社会与工作环境及习惯等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又反过来指导作用于人的行为活动。美国学者斯图亚特在《美国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美国人具有抽象、分析和实用的思维取向,他们的思维过程是从具体事实出发,进行归纳概括,从中得出结论性的东西。欧洲人则更看重思想和理论,他们的演绎型思维方式侧重的是感知世界和象征思维,他们喜欢运用逻辑手段从一个概念推导出另一个概念,他们依赖思想的力量。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和综合思维。形象思维是人在头脑里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表象这一形象思维过程中,人们往往从事物所表现出的相似性、相关性中发现隐藏在其中的深刻规律。中国人综合思维特点表现在将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它的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考虑。由于各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也就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

(2)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联系和关系的总称。

它不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创造文化的基础。而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它是组织内人与人之间心理关系。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和组织与组织的关系造成了社会关系的主体构造。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质。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观念,而在行为方式的具体表现是集体利益至上,人与人之间注重互助、依靠、亲密无间和人际和谐,注意“面子”,喜好共性。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在人际关系中以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为主旨,他们推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他们要求平等权益,注重自立、独立和隐私,他们喜欢个人竞争,喜好个性。

从美国文化社会关系的表层之下挖掘所发现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正是由于中美之间在人际社会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所以美国总是在人权问题和我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上评头论足,大加指责,造成了许多矛盾。按照文化功能论来分类,因为西方文化强调人是一切的尺度,而理性是这个尺度的本质及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把西方文化称为理性型文化;因为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东部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的表现形式突出了伦理的特征,所以被称为伦理型文化;而位于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因其强调伊斯兰教义是解决各民族、教派之间的矛盾的最高无上的原则,随着这些国家“政教合一”的政权的不断加强,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方式都带有典型的宗教色彩,所以我们把这种文化称为宗教型文化。

(3) 在人与然的关系上,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态度,但归纳起来有三种:顺从、制服与和谐。

持顺从态度的人们认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不是向大自然去索取,而是等待大自然的恩赐。哥伦比亚的美斯蒂索人和印度人对自然就持这种宿命论的态度。如果人们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得无助无奈,那么他们往往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社会及政治秩序。持制服态度的人们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要驾驭和制服大自然,从制服然的斗争中获得己所需要的一切。在许多西方文化中,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地区,人们常常持有这种观点。特别是在美国,然与物质世界应当受人控制并服务于人的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强调人是一切的尺度,在人与然的关系中最能体现人性本质的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制服自然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智力、体力和技能,人类通过能力不断地提升自己,以达到支配和主宰人之外的一切的地位。

持和谐态度的人们则认为,人与大自然是朋友,人应与然融为一体,人对自然有一分尊敬,但同时也利用然的力量造福人类,但不能过分利用然。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强调所有的生命形态和无生命物体的相互和谐与统一是相当普遍的观点。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主张“天人合一”。在印度佛教传入后,这一思想得到丰富和加强。

——郭莲.文化定义、文化差异、文化冲突[J].理论研究,2001(24).

4. 文化认同视野下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体现出了多样性。他们认同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又对西方的先进文化心存向往,欣赏和追求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长期受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对主流文化有准确的判断,但面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和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统伦理的行为时又难免会对过去所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信任,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不够坚定;他们追捧西方的洋节日、洋文化,但并没有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嫌弃。文化多元化与个性化明显的大学生组织要求高校创新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更新教育内容。然而从当前的教学实践来看,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均严重滞后于快速变革、发展的社会环境,其理论和实践无法满足广大学生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和需求。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空洞、方法的单一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加剧了问题的严峻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及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多元文化和价值观所带来的激荡不可避免,社会转型期制度的缺失及文化的无序会带来学生伦理道德的困惑、价值观的混乱以及信仰方面的危机,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以改善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确立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1) 充分认识文化认同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

思想道德教育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的。思想道德教育效果的好坏与教育主体和受教育者的文化认同度密切相关,任何脱离文化关照,就教育而论教育的做法,都不可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视角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使教育围绕文化理解、文化体验、文化批判与文化创造等目标来进行,鼓励大学生参与文化的理解、体验、批判和创造。通过构筑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高校可以对学生的文化认同产生重要的影响。思想道德教育与文化认同的紧密相联既可以使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促进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施,又可以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加深个体的文化认同。可以说,文化认同与思想道德教育相辅相成的关系既能够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民族信心、自豪感,又能够使道德教育取得积极成效,摆脱“假”、“大”、“空”式的空洞说教。因此,多元文化时代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理应成为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目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 积极推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健康向上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参照系统,明确了教育主体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使教育主体的行为有章可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不仅应在学生的认知、情感和需要等因素的基础上从学生个体的发展入手设计教育内容,而且应注意不同阶段内容的相互衔接和递进,使大学生对于多元文化能够做到正确鉴别、理性判断、合理选择。

(3) 充分发挥教师在大学生文化认同中的作用

教师在高校中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对学生的成长会产生重要影响,其言行会极大地影响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通过发挥教师在大学生文化认同培养中的作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首先,教育工作者要确立正确的文化认同观。教师在大学生管理和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交往频繁,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对大学生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不仅具有高学历,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学习者和传播者,是社会阶层中的文化精英。作为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员,教师对传播文化和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让教师有正确的文化认同观,学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包括开办文化讲座、组织演讲、举行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对教师队伍进行文化认同教

育。其次,教师必须率先垂范,努力提升身的人格魅力,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实践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

教师应当是学生在为人处事方面学习的榜样,只有教师身正,才能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树立威信,使学生从心底里信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后,文化认同教育要注重师生的交流。通过师生间的对话、交流而非一味的灌输更易于让大学生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教师不能将己的文化观念强加于学生,但是可以在与学生的交流中表明己的立场,说出己的看法及其理由,适时地引导学生,避免学生产生偏激的想法。

(4) 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

在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政治理论课无疑是主阵地、主渠道,其在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认同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是加强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也是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辩证对待各种西方文化的主渠道。针对当前大学生出现的多元文化认同现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宗教、哲学、中西方文化,有针对性地回答学生文化选择和文化认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大学生在正确认识和了解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正确的文化观,自觉地认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注重通过课堂进行理论灌输。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这种单一、封闭的教学模式无法调动起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已经不再适应当今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了。我们应当通过科学设计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使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教学内容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系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提高课堂教学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凸显课堂教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于硕.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与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创新[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二、问题性研究

1. 高校学生组织文化认同研究

关于高校学生组织文化认同的要素或是维度,目前尚无统一的看法。本文将高校组织文化认同区分为文化投入、文化归属、文化统合3个维度:文化投入。学生大学生个人主动参与到高校学生组织文化活动中,并积极吸收文化的相关信息;文化归属。高校学生组织文化归属是指大学生个人我感觉隶属于某个文化团体,并把该团体的价值观、社会规范视为自己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文化统合。文化统合是指学生大学生个人能把某一团体的文化与其它文化加以融合,而不会出现文化冲突。

另外,参照有关学者的研究,依照心理学的认知原则,将高校学生组织文化认同区分为其他3个维度:大学生对高校学生组织的认知,大学生个人了解组织文化的各种特性及传统;大学生对高校学生组织的情感,大学生个人对所认同的文化组织或文化对象产生归属感,而且在情感上有"团体内"与"团体外"的划分;大学生对高校学生组织的行为,不只在认知和情感层面认同该文化团体,更以具体的行为来支持文化的发展和壮大。

高校学生组织文化与组织认同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高校学生组织文化与组织认同之间体现相互依存的状态。**高校学生组织文化与高校学生组织认同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它们有一定的重叠部分,也有区别,但正是这种重叠使得二者之间呈现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从二者各自的内涵来看,高校学生组织文化被界定为一个综合的在组织中支配意义的准则体系,它是由学生对他们所属的组织的理解所定义的,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生活实践,而正是这些界定并帮助维持他们所认为的正常状态,并且支持那些他们相信是必需的或者是有价值的东西。高校学生组织认同反映了一个高校组织实体如何在它所处的文化中理解我,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与潜在的意义之间的关键连接。

(2) **高校学生组织文化与组织认同之间体现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就高校学生组织文化对组织认同的作用而言,高校学生组织文化对组织认同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高校学生组织文化作

为对组织行为中形成的组织成员共同认可的组织思维、目标、道德、价值观等的总和，它会促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取向和组织的整体的心理、整体的价值观念、整体思想、整体行为进行整合，使组织成为一个大学生利益的共同体，让大学生对组织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高校学生组织文化的形成，尤其是高校学生组织价值观的形成对组织中大学生大学生的行为和管理起到了规范化整合作用。

就高校学生组织认同对组织文化的作用而言，培养和发展大学生对高校学生组织的认同感有利于组织共同文化的深化。在高校学生组织中对文化的认同即是对组织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这些是文化认同的依据，高校学生组织管理中的最高境界是对本组织文化的认同。大学生对组织的认同感一旦产生，就会心甘情愿地把组织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和深化组织文化和组织集体意识，这里体现为一种一致性，即广泛共享的信念、价值观有助于组织成员之间达成共识，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进而对组织认同和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张杰,张娅萍.高校青年自组织文化认同研究[J].教育时空,2012(1).

2. 高校师生关系文化认同研究

文化认同是师生关系的核心。它对师生关系有着双重的影响：1.文化认同是建立师生关系的首要条件，是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2.文化认同度的提高，将直接改善师生关系，促进师生间的进一步良性交往。实际上也就间接影响着师生在交往中消耗的有效能量和师生交往的频率。文化认同是师生在交往互动中对相互文化进行不断碰撞、理解、承认、适应、规范和调适的一个过程。绝对的认同或不认同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总是并存着。

文化认同存在某种复杂的层次系统的，它可以被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初级文化认同层次（基本层次）、中级文化认同层次、元文化认同层次。

(1)初级文化认同层次（基本层次）也就是指某一文化群体对某一系统的日常生活习惯、风俗、生计方式等一般文化规范和模式的认同，它往往是人们从感官、感觉、习惯出发对某一基本生存文化的下意识的一致与统一。(2)中级文化认同层次指的是某一文化群体对某一社会一般规范、观念、价值体系、为人做事原则等抽象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体系的认同，它往往是人们从理性、理念出发对某一基本思想与精神文化的有意识的一致与统一。(3)元文化认同层次指的是文化群体对人类自身的和世界的普同性（Universalism）与整体性（Holism）认同，它是人们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的哲学思想上的自觉与觉醒。这就表明文化的认同层次是一步一步向前跃进的，初级文化认同层次一般表现在“物”的层次上，中级文化认同层次一般表现在一般精神文化的层次上，元文化认同层次则是全人类的一种普适性认同。就师生关系而言，就需要教师与学生不断加强文化交流与沟通，沿着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比如学术自由、崇尚科学、严谨治学等），不断提升文化认同的层次和各认同层次上认同的广度、量度与深度。

师生文化认同需实现的要求和意义，不是要求相互间在具体的文化与认知上的一致和统一，也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多样性的拥护，对文化差异性的容忍或者包容，而是一种高贵的态度，海纳百川，又能超凡入道的态度。也就是说，文化的认同不是一个极点，而是一个交往与实践中的过程，也是一种象征。教师的义务不在于充当真理的化身，让学生永无止境的竞相模仿，而在于鼓励和指引学生自己自觉地去发掘真理，使师生之间不再纠缠于个别具体的文化与意义上的差异，而共同迈向文化认知和感悟本质的追求。师生间交往互动的最大目的和意义就在于不断促进相互文化交流和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共同进步和自身的全面、协调和良性发展，最终获得自我实现。

——耿德英,帅俊杰.文化认同：高校师生关系的内涵解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1(6).

3. 高校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研究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前提。民族认同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表现为对本民族的认同（狭义）和对生活于一个大的共同

体的民族的认同（广义）；国家认同是指生活于一定国家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对于自己所处国家的认可和心理上的认同，承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表现为对国家共同体在思想、认识、理智、感情、意志、行为上的认同、肯定和服从。

作为“四个认同”之一的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它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同一民族通常都具有共同的精神结构、价值系统、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们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粘合剂”，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前提和最深层的精神基础，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则不仅维系着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同时也促进着民族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促进民族和国家认同教育。首先，要使学生明确各民族传统文化是在与具有强烈认同功能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交融中产生，并在相互认同中得以繁荣和发展。其次，要使学生懂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各族人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和纽带。最后，各民族文化在与中华文化交融、促进和认同中得到繁荣和发展，为更好地实现中华各民族认同和祖国认同提供了重要条件。创新文化认同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提升民族团结教育的效果。

——马海军. 创新高校文化认同教育新形式提升民族团结教育的效果[J]. 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3) .

4. 高校国际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校公民教育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以及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从西方国家传来并逐渐被国人了解和熟悉，这使得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规范、思想观念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使得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性虽然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世界文明的传播，但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思想相互激荡、交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尖锐，尚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广大学生面对多样化的文化环境难免会在思想上产生困惑和迷惘，找不准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国的公民教育尚处于婴儿时期，处于摸索阶段。我国从一开始实行公民教育就借鉴西方的公民教育作为蓝本。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中的公民教育发展程度各不相同，这也意味着学校中的公民教育同样参差不齐。同时各种西方思想、价值观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对我国现行的学校公民教育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冲击。国内与国外的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让我国的文化环境更加复杂。最后，随着世界文化交往的逐渐扩大，学生容易在世界交往中迷失自我，缺乏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现阶段“我们的学生既缺乏对世界文化的判断、选择和认同，也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接纳，还缺乏对丰富文化资源进行选择的能力和跨文化的交流能力”。

(1) 母语地位岌岌可危

“认同首先是一种定位，是个体为了在组织或团体中寻求并获得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政治学上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国家和民族的定位，实质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化认同追求过程而这种定位，首先体现在文化认同上，文化认同又进一步体现在母语认同上”。近年来，我国所兴起的英语学习热潮，虽然明显增强了我国学生的英语水平，但是对英语的大力提倡必然会削弱母语在我国公民心中的地位，我国民族语言文化在国人中的地位也在渐渐丧失。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消失，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同时，我们的学生中间崇尚西方节日，已经有了被同化的迹象。

(2) 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逐渐丧失

“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是指一定民族的民族意识、积极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信念的综合，以这样的概念来思考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其包含的核心内容应该有，第一是华夏子民所具有的强烈民族认同感和团结统一的民族归属意识；第二是爱国报国的国家意识；第三是天下为公的整体精神和责任意识；第四是爱好和平的和平主义”。然而，现在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我国学生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越来越淡薄，民族虚无主义和片面否定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在学生中间大行其道。

——徐龙泉, 于爽. 多元文化背景下学校公民教育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J]. 教育时空, 2014(7).

三、对策性研究

针对文化认同感缺失的表现, 我们在此提出一个概括性思路, 即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为指导理念。

1. 开设公民文化课程, 提升学生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来的。其内涵就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 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 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历程的精辟概括。面对我国母语和传统节日社会文化地位的丢失, 我们应该通过文化自觉使我国学生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历史, 在面临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 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学校公民教育要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宣传力度, 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最重要的是让学生知其所以然。

2. 运用现代传媒技术, 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就是对我们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我们知道文化自信来源对文化的高度自觉, 如果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不清楚、不了解, 那就谈不上要实现文化自信。因此, 学校在进行公民教育中应该通过现代传媒的作用, 例如互联网、电视、电影、广播等手段向学生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以及对世界的影响, 这样既可以让了解本国的文化又可以让学生增强对我国文化的自信感和自豪感。

3. 培养文化创新意识, 实现学生文化自强

文化自强的核心的是创新。学校实施文化教育的时候决不能照搬照抄, 要让学生产生对于西方文化“师之、礼之、纳之、化之”的态度, 把西方优秀的、先进的思想纳入并自化成我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说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文化自强必须依靠学生, 因为学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但是现在许多学生英语很好、数学很好, 但是对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如果这样中国文化的自强之路是实现不了的, 因为中国文化的自强之路是由学生个体文化的自强之路铺就的。

信仰隶属于文化, 信仰的建立也依赖于文化。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大众文化构成了我国文化的基本生态, 多元文化的冲突造成了当代青年学生信仰的迷茫。为了让青年学生摆脱困境, 高校信仰教育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多元文化中去, 通过培育传统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提升大众文化, 帮助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信仰。

【媒体文章刊载】

编者按：文化认同是我们身份识别的根本。你可以对种种社会现实不满、失望，却无法割断你血管里的文化脉络。文化认同正被作为一个中国的大命题提出，这些年来传统文化的种种“复兴冲动”，虽然有可笑之处，却也不妨可以看作是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努力。可是，这样一来，中国人会不会在探寻文化认同的路上迷失方向？文化与信仰，文化认同与文明冲突，所有的这些都是有责任心的国人所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通过主流媒体的专题讨论，无论观点如何，或多或少或许能够给予读者以新的启示，仅作抛砖之用，实为引玉之功。

强势文化力保主流地位 弱势文化强调自我认同

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

黄晴

■一种文明危机感在全球弥漫，它不但在弱势文化国家存在，也在强势文化国家存在；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也在发达国家存在

■文明对话要有前提，就是意识到文明的相对性和不同文明的共同性，从而建立对文明多样性的认可和容忍

■承认文明的相对性，就是承认某一特定文明只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特定话语体系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性

危机之感遍布全球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到今天已经10年了。10年来的世界出现了多次战争和冲突，从科索沃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和冲突又和宗教、民族和文化因素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文明冲突”似乎成为了一个自动实现的预言。

另一方面，一种文明危机感在全球弥漫，它不但在弱势文化国家存在，也在强势文化国家存在；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也在发达国家存在。在这种弥漫全球的悲凉之雾中，一种文明常以另一种文明为造成自己毁灭的根源。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文明危机感却相当深重，尽管这种危机感受有时表现为过度的文明自负。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这种危机感的体现。美国的国内文明危机感来源于其文化多元化的演变，例如拉美文化在西部的延伸，少数民族族群人口比例的上升，部分族群的伊斯兰化，文化马赛克现象的固定化等，均对美国的主流文化（WASP即白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清教徒）构成压力。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的出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均是这种文化压力的体现。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是其精神传统和活力之源。由此，美国处于一种相当微妙的两难局面，任由文化多元化发展，主流文化有可能日渐失去其主流地位，而如采用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的办法去压制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则会动摇美国合众为一的精神之基，从另一种意义上摧毁美国文明，导致巨大的社会分裂。亨廷顿1998年曾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有过一次长谈，坦承他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担忧才是最深切的。

“9·11”事件导致了美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为美国国内的这种文化压力提供了外向释放的渠道，布什不经意的“十字军”用语及“邪恶国家”等说法均有相当浓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反映了经过长期酝酿发酵的一种美国文化感觉。

欧洲的文明危机感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在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欧洲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对美国文化的世俗性和暴发户特征，欧洲相当反感，但不屑之中却有更多的无奈。其二，由于欧洲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削弱了其文明的整体力量，因此内部文化整合一直是欧洲战后的努力方向。其三，欧洲文明是历史悠久的老文明，和一切老文明一样，存在“历久而弊生”的问题，存在着衰落之忧，存在着创新方向的求索。

发展中国家或弱势文化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文明危机感之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弱势地位和文化挫折感一直在这些国家引发着激烈的精神震荡，引发着反抗、求索和学习。弱势文化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许多两难问题，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对时代的不适应性，

需要改造与更新，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在文化变迁中失去“自我”，失去对自身主体文明的“身份认同”，因为这意味着其特有文明的消亡。在求索中，发展中国家常常在走曲折的路，“西化”失败，回归传统（如伊朗的“白色革命”和伊斯兰革命）。传统失效，再度学习。文明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整合成为弱势文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架构和组织形态。它有如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旦形成，就有自我保存、复制乃至扩张的冲动。正如生命遭遇危险时往往产生出特殊活力一样，文明危机对于文明也有危险与机遇两种意味。

诸神争吵诸神渴了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核心是所谓信仰价值体系，这就是文明难于改变，互容，融合的原因。在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中，很大意义上是指宗教。他把中国文化归入儒教文明的板块。实际上，所谓儒教只是一种世俗理性的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基本没有宗教中的超越性特征。对于神鬼之说，孔子持“存而不问”的态度。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借神道设教的事例，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即使在民间信仰中，也有很强的世俗功利成分，所谓“急时抱佛脚”。在当代中国，这一文化特征仍然保留下来，因此在理解宗教人群的思想情感上缺乏感性基础，“经济决定论”、“利益决定论”、“权力决定论”容易深入人心（王缉思语）。

《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是中国学者辛旗1993年的一部著作，几乎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同时面世。他指出，“诸神争吵难以止息，还是那个古老主题：教义、利益、疆界”。利益、疆界之争在当今世界大体上是在民族国家间进行，教义之争则和国家的宗教特征相关，似乎更具“文明”特性。既然文明在社会组成中发挥黏合剂的作用，身份认同的作用，人群凝聚的作用，其重要性就决不亚于具象的“利益”。在中国，即使没有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或民族情感也会发挥这种功能。应该说，晚清以降，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冲突也是相当强烈的。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有理性功利特征的传统，有和而不同的传统，因此在国家取得独立平等地位，现代化进程取得进展，汲取和兼容外部文化获得实效的情况下，可以大大淡化与外部的文化冲突。

《诸神渴了》是法朗士的一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意指在社会剧烈变动和冲突之际便是诸神渴了之时，凡人的血成为供神解渴的祭品。用这一词语形容历史和当今的许多宗教冲突也不为过。

信仰体系是一种类乎公理的体系，无需证明。不同的信仰体系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供辩论的逻辑平台，所谓“诸神的争吵”只是彼此信念的重申和强调。然而，诸神却因争吵而渴饥，尘世便出现了许多流血的悲剧。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圣城之战到今天的巴以冲突，从印度的神庙之争到塔利班的毁佛之举，从“9·11”到阿富汗战争，人们看出，由于信仰的绝对性导致了对精神主导权的强烈追求和争夺，导致了暴力的使用和冲突。当然，在精神层面的背后，有着许多现世的利益因素。此外，精神层面也有不同的形态，有因绝望而拼死对抗，有因恐惧而激烈反应，有因自负而摧毁一切异己。

文明对话共处之途

亨廷顿曾说：“我所期望的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全世界‘文明的对话’。”亨廷顿持保守的基督教信仰，但他意识到文明对话的极端重要性。

2000年为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是根据伊朗总统哈塔米的建议而做的决定。笔者2002年在伊朗访问时，看到报纸上有关于“文明对话”的大篇幅讨论。伊朗被西方某些人视为原教旨主义国家，但其学者的讨论却开放而理性。在德黑兰，犹太教堂和其它宗教教堂均正常活动，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不具容忍性。

上述情况说明，文明对话已成为人类日渐普及的共识。

文明对话要有前提，就是意识到文明的相对性和不同文明的共同性，从而建立对文明多样性的认可和容忍。亨廷顿对此有相当深刻的话：“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文明（包括宗教）反映了人类组成社会的一种内在伦理道德要求，不同文明尽管形态各异，

但内在的道德属性却有相当的一致性，并都有所谓“济世救人”的宗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三教同源”的说法，恐怕就是指不同信仰体系的道德共同性。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三大宗教间也有许多共同的历史传说，许多的渊源和交错。

不同的文明往往就是不同的话语体系，而不同的话语体系背后往往是共同的人类追求。承认文明的相对性，就是承认某一特定文明只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特定话语体系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性。

近年来，人们日益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对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现在，保护和发展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课题也开始进入世界的议程。正如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完全可以沟通一样，不同文明体系的人们也完全可以在互相尊重和加深了解的对话中达到日益充分的沟通，从而降低文明冲突的烈度并最终消除文明的冲突。

——《人民网》刊载

文化认同是增强爱国意识的基础和条件

张砥

对任何国家而言，文化认同都是最基本的认同。爱国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爱本国的文化。振兴中华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新形势下我们培养爱国意识、增强爱国情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新形势下，要实现更好的爱国，迫切需要更好地凝聚国人的文化共识，只有全国上下一起发声、一起努力，人人充当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获得历久而弥新的生命力。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央视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经播出便掀起了一股“汉字听写热”，并一度获得全国第二的收视率。长假期间，同样广受关注的还有央视关于爱国的系列街访，镜头面前，答案五花八门，网络之上，思考和议论更是如火如荼。两档节目火爆荧屏，让人们看到了汉字的魅力、体味着爱国的情，更烘托出一条共同的情感主线，那就是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和灵魂，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任何国家而言，文化认同都是最基本的认同。中华民族五千年耕耘奋斗，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成果彪炳史册，改革开放 30 多年发展奇迹惊艳世界，其背后都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坚守。时至今日，我们强调要以文化兴国、强国，都必须构筑在文化认同的精神基石上。如何振兴中华文化，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新形势下我们培养爱国意识、增强爱国情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置身这个大背景下审视，此番汉字听写大会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巨大反响，就在于其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强烈共鸣。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精髓和最重要的传播载体，汉字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一大根本标志。但一段时间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大浪面前，很多人对“英语热”趋之若鹜，对“洋节目”奉若圭臬，反而将对汉语的教育、对本国文化的传播放在了次要位置。再加上电脑时代的冲击，提笔忘字、会说不会写的现象日趋普遍，汉字所承载的文化感和历史感正在被淡漠。可以说，汉字所面临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当前的困境，那就是重视不够，自信不足。在这个问题上，汉字听写大会可谓抓到了点子上，像这样的文化节目还应当更多一些。

强大的文化认同是增强爱国意识的基础和条件，这已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新形势下，要实现更好的爱国，迫切需要更好地凝聚国人的文化共识。应当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人们思想观念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难度和挑战在加大。从国际上看，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意识形态的交流和碰撞，都在日趋激烈。要在这场较量中占得先机、把握主动，就必须更加注重文化的能量，让中国声音讲得出、传得开，让“中国价值”占据应有的位置。而这些都需要有一个高度认同的文化传统作依托。

实际上，爱国常常就体现在每个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上。建设文化强国，绝不是看文艺晚会能搞多大、多气派，各种选秀大赛有多火、多热闹，而是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始终坚守和发

扬光大自己的优秀文化。我们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文化环境，只有全国上下一起发声、一起努力，人人充当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获得历久而弥新的生命力。

这些年，我们纠结于文化精品匮乏，文化竞争乏力，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我们在吃透中华文化精髓上存在欠缺，在传播传统文化精髓上存在偏误。在新的传播格局下，人们阅读和接收信息习惯正在改变，对文化的理解和诉求也在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弘扬自身传统文化的时候，不能生吞活剥、囫圇吞枣，而必须注重与时俱进的梳理与创新，学会运用现代传播方式和手段来进行传承和弘扬。就拿汉字听写来说，以竞赛的形式通过电视节目展现出来，就能激发起这么多人识字、认字、写字的热情，足以说明我们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上可挖的潜力还有不少，能做的文章也有不少。

爱国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爱本国的文化。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力量作支撑，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实现“中国梦”已在路上，只要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好地凝聚对中华文化的共识，激发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让人民更好地共享文化繁荣的成果，就一定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北京日报》2013年10月。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谈文化？

30多年的中国改革，“文化热”一直没有降温，伴随中国社会发展的节奏一路走来。文化成了不同学科参与最多、不同社会阶层关注最多的领域。而且我们发现，全社会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更多情形下呈现为一种非官方的自发行为。今天，文化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种新的发展语境无疑也给我们的文化思考与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今天的文化研究应该如何贴近时代？到底什么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探讨应该怎样和老百姓的诉求相关联？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文化讨论不是无文本的操作，需要我们诉诸价值关切，因为文化反思的目的是文化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自觉之路应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关切，在全球化视野下对人类文化危机的反思和觉醒，并通过积极参与文化变革，获得文化转型的自主地位和能力，开拓文化发展新方向、新道路，以期实现中华文化的自我升华。

从这一视角看，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围绕以下问题达成共识：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研究文化问题，必须克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今天的人类，正在由离散时空文化走向同步时空文化，这意味着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引起全世界关注。在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探索和特色实践，都开始具有世界意义。

因此，今天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发展与实践，需要培育全球性思维，以自信从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思维的偏执既妨碍着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妨碍着中华文明精神的世界传达。我们只有以和谐的、建构性的思维审视民族文化的发展，才能做到既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而又不失去自我，进而对不同文化形态所进行的比较、沟通和理解才有真正的意义。与他者文化共同建构新的世界文化体系，才是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

其次，要培育健康的文化发展观，超越文化研究的狭隘视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否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其突出标志是培育一种为全体国人所共同持守的价值观念。我们这里所讲的健康文化观，是指在文化哲学层面所确立的人类文化实践的自觉意识，它是判定一种文化好与不好的基本价值尺度，是引领社会大众文化风气的恒久意义追求。当代中国文化观的建构，必须蕴含经验与超验、理性与价值、历史与未来的双重关切。

一种文化观的确立，意味着要对当下文化现实进行自觉的认识与反思，进而对文化进行能动的价值构建。培育正确的文化观，是构建和谐社会并发展和谐文化的重要前提，是中华民族文化

自觉的重要标志。社会发展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文化必须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器”。

最后，文化研究要自觉切近中国问题。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最基本视域，只有直面中国问题，把握时代的脉搏，文化研究才能找到源头活水。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新观念、新意识不断生成，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这客观上也为文化的多元互动发展奠定了基础，催生了多样文化形态的形成。当代中国有四种基本的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

社会文化的多样化虽促成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但也造成了各种文化矛盾冲突，如文化的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事业与产业等冲突，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研究自觉强化文化的自省意识和批判意识，立足中国未来发展去妥善化解各种文化矛盾，以保持文化的创造性活力。

——光明网-《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知名文化哲学学者 邹广文）

【专家学者观点】

编者按：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各种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费孝通提出通过“文化自觉”达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图景，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将其中的新资源作为新文化的发展基础，使中国达到自主转型的目标，并通过“文化自觉”融入世界，为人类文明共存和文化自觉的发展开辟新路。文化、文化认同、信仰、信仰教育、文明与文明冲突……这些指向人们深层信念和思想的词汇和现象，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是指引我们向前发展和进步的思想源泉，观念层面的东西往往会更加引起不同学科背景专家学者的思考，而他们的思想成果终究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呈现中国：什么是“中国”风格？

——葛兆光教授在上海文化论坛上的讲演

如果我们现在要呈现中国，给世界一个新的中国认知，既让世界看到中国绚丽的文明和对历史的自觉，又不至于变成文化民族主义的盲目夸张，你要找什么作为“中国风格”和“中国象征”，使其一方面反映历史、另一方面又反映现实呢？中国的历史很长，文化很丰富，艺术也很多，仅仅以一想就想到的视觉艺术品来说，从商周的青铜器、两汉的画像石、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书法碑帖和宗教造像、宋元的绘画，可以挑出来展示中国的东西多得很，仅仅挑选一下，就要花很多精力，也需要有充分的知识为基础。所以，要思考，什么是中国的文化象征，用什么来呈现中国？

一、“中国文化”不能抽象加以定义

只有讲清楚这个文化是中国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者说华人世界有、其他民族没有，这才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文化。

你要找出一些能够成为典型象征的东西，来呈现中国文化，呈现中国风格。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跟世博会有关。显然大家都在想，什么是能够鲜明呈现的中国风格？说实在话，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没法给出一个很完整、很确切的答案。

要说“什么是中国风格”，请让我从“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讲起。这些年来，我在很多场合一直批评某些论述中国文化的方法。因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或者论文，常常是一种概论式的，或者说很宏观、很一般的在介绍中国文化。我觉得，要讲清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两字是最重要的，而“文化”倒是谁都有的。你只有讲清楚这个文化是中国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者说华人世界有、其他民族没有，这才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文化。不能把那些“非典（型）”东西统统叙述一遍，就算是中国文化了。前些时候，我曾经在一次讲演时说到，特别能够呈现中国的文化，可能有五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这虽然是神话，但是使用象形为基础的汉字，而且至今还使用这样的文字来思考和表达，这在汉族中国人的思考方法和意义表达上，确实影响深远而巨大；第二个是古代中国的家庭、家族、家国结构，和在家族伦理、家国秩序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儒家学说，以及儒家的一整套有关国家、社会 and 个人的政治设计。大家都知道，“修齐治平”的思想也构成了古代中国的传统；第三个是“三教合一”的宗教世界，“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这种儒道佛基本彼此相处、互为补充的宗教生态，大概是世界其他很多区域或国家都罕见的；第四个是理解和诠释宇宙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在这套学说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知识、观念和技术，不仅包括中医、风水、预测，甚至还包括政治、审美等等；最后一个是天圆地方的观念，它形成了中国人非常特殊的天下观念，以及在天下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世界图像，而且还在天下想像中，形成了古代以朝贡体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如果你拿这五个方面跟基督教文明比，跟伊斯兰世界比，甚至跟东亚、南亚也相信佛教、也用儒家律令的区域比，你会发现，这才是“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不要用“放之四海皆准”，来抽象和泛泛地定义中国文化。

二、寻求具体的中国文化象征

什么是我们可以用来呈现中国文化的风格？我不太愿意说“元素”，更愿意说“风格”，或者说中国风格的“象征”，什么是“中国风格”？换句话说，就是什么东西才能在视觉、听觉上或者说在感觉上呈现中国特点？先说明一点，我不太喜欢用“元素”这个词，因为“元素”这个词，总给人以“添加剂”或“调味料”的感觉。

让我扯远一些，先从日本风格讲起。我们可以从日本反过来看，是什么让人记住了日本，或者说，日本人着力向外界呈现的日本风格和日本特色是什么？很多欧洲人包括中国人，都会感觉到，日本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好像一讲出来、一拿出来，人们马上会有自然的反应，说这是“日本的”。比如说浮世绘，就是很典型的，它的色彩、变形和构图，就很有特点，以至于17、18世纪的欧洲，很多人认为浮世绘就代表了东方，就是东方绘画的最高境界。还有一个是鸟居，就是放置在神社前面，有点儿像中国牌楼、红彤彤的那个东西。我看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有一点像这个东西重重叠叠起来的。可是在很多外国人心目中，鸟居仿佛就是日本的象征，它是朱红色的，远远看去很醒目。我们知道，有些形式感很强的东西，如果反复出现，就会变成一种固定的文化象征；鸟居就是这样的东西。再比如日本的枯山水，这个枯山水很有趣，就像我们中国的庭院园林，可是它着意简洁萧散，稀疏的树枝、清浅的水池、几块简练的石头，把很纯净的沙石撒在那儿铺地，还用竹耙耙来耙去，梳理成一些图案，整个儿构成了一幅很简练的画面，多少带有一点苍茫萧瑟的感觉，跟中国的园林完全不一样，它是人工营造的自然。很多人认为日本人追求自然，其实，日本人并不真的追求自然，日本人追求的是人工精雕细琢的自然，它是人为的、精致的。这不像中国；中国本质上追求的是自然而然，很纯粹、放任的自然。最后，再说一个容易令人引起联想的日本象征，那就是富士山，不止是很巨大的、真的头上戴雪的富士山，也包括色彩很艳丽但是非常典型的画面上的，就像平山郁夫画的那个富士山。日本人很有意识地向西方推介他们的日本色彩、日本风格，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西方人认为日本代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甚至一想起日本来，就把它理解为这是跟西方不同的“东方”。

其实，很多风格和色彩并不是日本的。举两个例子。我特别注意到的一个是“禅”。因为日本很早就有像铃木大拙这样用尽心思，以西方语言和概念向西方人宣传禅思想和禅文化的有心人，也有西田几多郎这样努力在佛教禅宗中发掘资源，重组现代日本哲学思想的学者，他们从20世纪初开始就向外推销、向外普及日本文化，包括日本禅宗，所以，在很多欧洲人、美国人心目中，禅宗是日本的宗教，在很长时间内，“禅”在英文世界里叫ZEN，发音是按照日文来的。可是禅宗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呀。直到现在，西方还是说ZEN，只有专门研究禅史的学者才渐渐改用CHAN这个拼法。还有一个就是围棋；围棋当然是东方智慧，非常复杂，它的棋盘与天地宇宙象征有关，它的变化比国际象棋要复杂多了，所以，至今电脑可以在国际象棋上战胜最高段的棋手，但是在千变万化的围棋上，再强的电脑却也只是初级水平。围棋是中国的发明，考古已经发现了很早时期的中国围棋实物。但是，在西方，围棋的发音是KO，这也是日文来的，这使得很多西方人认为围棋是日本文化。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应当和日本去抢“东方象征”。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可以用来呈现中国文化的风格？再说一遍，我不太愿意说“元素”，更愿意说“风格”，或者说中国风格的“象征”，这比较好一点。中国和日本，不要看文化有一些共同渊源，其实有很多东西不一样。比如欣赏石头。刚才讲的枯山水里面有石头，日本佛寺里有石头，神社里也装饰有石头，但是很多是圆圆的、光滑的石头，最多有些苔藓，他们并没有中国的奇石传统，而奇石传统，中国文人很早就有，中国文人喜欢和欣赏的石头，包括各种园林里最重要的观赏的石头，是太湖石、灵璧石，就像米芾说的，得瘦、皱、漏、透。一看园林或庭院里供的石头，就可以知道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日本很注意捍卫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也很注意展示日本文化的魅力。除了上面讲到的浮世绘、枯山水、禅宗和围棋之外，他们还相当着意地向世界介绍很多他们觉得象征日本的文化，有相扑、艺妓、神道（神社）、祭祀（如京都三大祭）。当然，他们也有为了宣传自己的文化，过分强调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独立性，甚至闭着眼睛否认其中的中国渊源的时候。我讲一个亲身

经历的例子。1998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任客座教授，当时正好有日本NHK电视台做一个考古节目，那时，在奈良一个叫明日香村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古坟，为了不破坏古坟，他们只是把一个类似胃镜那样的镜子伸进去，借助这个仪器，看到了古坟四壁，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就是“四灵”，这是一种中古很流行的墓室壁画的绘制方式。参与电视转播的专家就说，这个古坟是日本特色。后来有人问我，我说这是从中国中古墓室传来的壁画传统。可是有的日本学者却很不愿意这样说，最多只愿意说，这是从百济过来的，像当时NHK的一个主持人就是这么说的。其实，就算是百济来的，也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在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很多，中古时期的墓室四壁多有这个绘制方式。但是，日本人为了捍卫自己文化的独立性，非要把它说成是日本自己的不可。这也是出于民族自尊吧。

所以，对照日本，我们也要想一想，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风格，而这个中国风格又是由什么传统的象征物呈现的，这些文化象征又怎样能够以现代形式，简明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中国”来？我总觉得，世博会设计者应该在这方面下工夫，找到一些独有的、又能够很简明地呈现出来的象征物。我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如果让我乍一想，我也会想到四灵和麒麟。在中国，四灵不仅是四方、还是四季的象征，麒麟则是中央的象征，麒麟又据说是对远方异兽长颈鹿的想像和变形，它倒是很中国化的，就像华表，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很惭愧，我的兴趣和知识有限，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多数是和历史有关的象征物，像古代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中，还有很多东西很有味道，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就能感受到古代中国对天上、地下、人间三重世界的想像。又比如说，古代青铜器反复出现饕餮纹、云雷纹，它也很“中国”呀。中国绘画中的水墨画，最受人推崇的是仅仅用墨的浓淡、干枯、湿润来表现自然的层次和远近，这样的“中国的”味道，我们怎样能把它转化成现代形式？

大家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总是跟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状况有关；大凡外国人对异国的记忆和印象，常常依赖几个典型性象征，西方人想像中国是这样，中国人想像外国也是这样。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多灾多难，国力衰微，在外国人的想像和印象里，小脚、辫子、鸦片加上酷刑，这些经常出现在西方人的中国绘画里的东西，常常成为中国象征。有一年，我到荷兰访问，著名的莱顿大学图书馆保留着不少高罗佩收集的近代欧洲的中国绘画。高罗佩大家应当很熟悉，就是那个当过外交官，编过《秘戏图考》、《狄公案》的西方学者。他多年收集的文献中，有好几种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素描集，就是画的中国行刑图，比如说凌迟、戴枷、游街、站猪笼、挨夹拶等等。这象征着中国的残酷，也表现着欧洲人的偏见。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呈现中国，给世界一个新的中国认知，既让世界看到中国绚丽的文明和对历史的自觉，又不至于变成文化民族主义的盲目夸张，你要找什么作为“中国风格”和“中国象征”，使其一方面反映历史、另一方面又反映现实呢？中国的历史很长，文化很丰富，艺术也很多，仅仅以一想就想到的视觉艺术品来说，从商周的青铜器、两汉的画像石、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书法碑帖和宗教造像、宋元的绘画，可以挑出来展示中国的东西多得很，仅仅挑选一下，就要花很多精力，也需要有充分的知识为基础。所以，要思考，什么是中国的文化象征，用什么来呈现中国？

三、旧传统必须要新诠释

当下的现实环境和迫切危机，决定你发掘什么样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才决定你挑选什么资源。

所谓“传统”，到了现代，必须要有一些新诠释。对于文化传统，我很反对人们简单讲“继承”，也很反对简单讲“影响”。为什么？因为“继承”和“影响”两个词，让人感觉好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子英雄儿好汉”，“继承”好像就是现成地拿过来，就像继承遗产一样，除了交一些遗产税外，祖宗的钱可以现成地拿来就花；还有一个“影响”，影响好像是古人有意教育了今人，古代简单塑造了现代，后人只能等着教训，连挑选和改造的可能都没有。

其实，所有的文化传承，都有三个连续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传统文化只是历史留下来的一个资源仓库，这个仓库并不都是好的东西，或者都是坏的东西；就算都是好东西，也不是可以“吃现成饭”、“穿现成衣”的。它是一个纷纭杂陈的资源仓库，等待后人去挑挑拣拣。所

以，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挑选，挑选是要花心思的，要根据当下回溯历史，当下的现实环境和迫切危机，决定你发掘什么样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才决定你在这个仓库里面挑选什么资源。第三个环节就是“诠释”，旧东西要有新解释，因为有这个重新解释，“传统”就不一定非要原汁原味不可，强调传统要原汁原味，那是“原教旨”，是“墨守陈规”或者“刻舟求剑”。经过诠释的传统，不是旧传统，而是新传统。这样，旧传统、新传统才能不断传下来，不断由旧变新。这才是文化的传承。

这个文化传承，现在我们做得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承认，似乎还不很好，也不很让人满意。一方面，从晚清民初以来，西风压倒东风，中国总是处于被动追求富强的紧张之中，总希望割断拖着的历史尾巴，轻装跑步进入世界，把现代赶快带回家来，所以，常常简单地批判传统，希望彻底地日月换新天。但另一方面，为了在世界汹涌大潮中守护中国的存在，又总想誓死捍卫传统，也形成了自家宝藏无限好的习惯，敝帚自珍，什么坛坛罐罐都留着，所以常常忽略了传统需要新诠释，文化需要新转型。当然，现在又有新问题和新说法出来了，根据一种来自西方的洋理论，说我们挑选文化象征，由于处在西方强势下，不得不去了解西方人愿意听什么、喜欢看什么，只好按照西方人的口味来包装出一个，或者重新造一个给他们看的“东方”，就像来料加工一样，活儿是自己的，图纸是人家的，这常常被人批评为“东方主义”。这也许是有了一点儿麻烦。但是我想，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采取固执的民族主义，他们喜欢看什么我们就偏不给他们看；这也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选择。

在我看来，有一些事情会对我们有启发。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汉字。我在美国华盛顿的赛克勒博物馆看过徐冰的“天书”，其实，看上去满篇儿是汉字，但每个字都不是汉字，但因为它几十米长，一米多宽，悬挂在半空，乍进去看，就占满了眼眶，让人感觉是置身于一个汉字构成的世界，人好像处在一个中国的文化空间，给人很强的视觉上的文化震撼。为什么？我们就可以探讨一下它传达和呈现了一种什么感觉？现在大家看，拳击手泰森，胳膊上的刺青是汉字；NBA篮球明星，肩膀上刺的也是汉字。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要刺？是很神秘，还是很有趣？另外，吴冠中的画，技法好像是西洋的，用的原料也似乎是西洋的，但是，他有中国风格、中国味道在里面，一看就和西洋人的画不一样。另外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小提琴、大提琴，以及伴奏的乐队，大多是西洋乐器，形式也是西洋的，但是，它的旋律却很有中国味道。我觉得，“味道”这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它却很重要。古代中国的画论、诗论里面，就爱讲“滋味”和“神韵”，这味道就是滋味和神韵。

因此，如何呈现中国，一定要有一点“招数”，要有把传统诠释到现代的一些技巧、方法和思路。近年来，我看到一些创作流行歌曲的人，他们开始有一些自觉意识，想办法在流行里穿插传统，他们提出，古诗词、古意象、古词语，加上新配器、新旋律、新唱法，这是否也是一种努力呢？

四、中国象征需要有精神来贯穿

当中国文化成为“元素”，当中国风格只剩下“调料”，人们都注意碎片化的包装起来的东西，而没有精神贯穿和支持，这只能让人“买椟还珠”。

我一直强调，如果把一些中国象征都只是当作“元素”，我感觉有一点像食品添加剂。现在，不太主张用食品添加剂，因为它破坏天然，影响健康。“元素”有点儿像把文化和传统当作装饰性的小挂件，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就像人家评论宋词时讲的，看上去五彩缤纷，但是“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断”。所以，我始终觉得，中国象征也好，中国元素也好，更重要的，是其背后要有精神来贯穿。没有这个精神的贯穿，表面上样样都是“中国”，内涵恰恰不是“中国”。出现画面的时候，来一个红色的中国结；奏交响乐的时候，突然插上两段锣鼓和京胡，这是不是中国化？是不是呈现了中国？未必。我觉得中国传统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历史、有精神的文化。所以，我一直很担心，当中国文化成为“元素”，当中国风格只剩下“调料”，人们都注意碎片化的包装起来的东西，而没有精神贯穿和支持，这只能让人“买椟还珠”。

中国人的信仰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博导）

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常有人问起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当他们得知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中国的实际，并且至少已经存在了二三千年来。不过他们大概并不了解，虽然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仰。

近来儒家学说得到主流肯定，于是有人声称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翻开历史，表面上似乎的确如此。特别是宋元以降，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实际上，真正的纯儒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内心什么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报应，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个能自欺欺人的解释，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试。

至于在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还有极其广泛的实用性、地方性崇拜。如各地有土地神（或称土地公公）、城隍，家门口有门神，灶头有灶神，理财有财神，科第有魁星，婚姻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观音，驱蝗求刘猛将，养蚕祝蚕花娘娘，治蛟找许真君，航海靠妈祖，还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河神、海龙王、阎罗王、玉皇大帝等各司其职，简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或鬼督察照料，都可以通过虔诚的膜拜和丰盛的贡献得到相应的庇佑或化解。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说一时见不到效果，那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所以祈求者完全可以“今世不修修来世”，在下一辈子得到弥补。

中国早期的鬼神信仰、多神信仰没有能发展成宗教，本土产生的道教先天不足，外来的佛教越来越与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结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君主制度过于强大。皇帝作为“天子”体现了天命和天意，天则通过太阳黑子、日蚀、彗星、地震等各种天象和灾异显示自己的意图和警告。皇权与佛、道、儒、鬼神早已合为一体，即使偶有冲突，如官府对某些民间崇拜的禁止、对某些宗教活动的取缔，也没有影响这种广泛的结合。改朝换代或皇权的盛衰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反而会产生新的方式，或者使之更加广泛。例如，满族入主中原后，不仅全盘承接了明朝的格局，还密切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加封了班禅额尔德尼。对外来宗教，只要它能服从皇权，主动适应中国的状况，就能得到容许，并为进一步传播获得空间。如利玛窦等擅自修改教规，宣称天主教与儒家学说暗合，容许信徒保持对君主、祖宗、孔子等诸多偶像的崇拜，所以不仅能在明朝生存，还赢得包括大学士徐光启在内的一批高官和社会精英的皈依，使天主教在中国有了传播的基础。

一种信仰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得到长期延续，证明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和民众的需要，无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传统的延续起着积极作用。尽管从秦始皇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越来越具体和深入，但直到民国年间，政治权力的作用一般仅延伸到县一级，在发达地区才能延伸到部分镇、乡。法律条文堪称严密，但也无法贯彻于基层。中国式的信仰恰当地填补了这些空白，与宗族、乡绅结合，在日常动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那时的乡村、山区、边远地区根本没有任何行政或军事机构，有的连保甲、乡丁一类治安人员也没有，更没有无所不在的警察和探头，要杀人越货易如反掌，而且几乎不会得到追究，但由于多数人相信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即使盗匪也不会过分，如谋财不害命，劫财时给苦主留下保命钱。又如孝道得以长期维持，表面看似是儒家学说和统治者倡导之功，实际上是信仰的震慑作用。不孝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招致天罚。我幼时还不止一次在雷雨时听到老人的警告，不孝父母会被“天打煞”（雷击而死）。有时听到绘声绘色的传闻：某村某人当场被雷击劈死，背上显出乌黑的“不孝”两字，接着就是该人具体的不孝行为。所以每次打雷时，都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连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不良习惯，也会受到天谴的警告，如不敬惜字纸，糟塌粮食，说话不老实等。

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

调和了官民冲突。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和苦难可以解释为本人前世罪孽所致，或者是因此而形成的“命”中注定。他人之所以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幸运是由于祖上积德或本人前世的孝行善行。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途径是从此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为本人修来世，为子孙积德。否则，下一辈子依然做牛作马，不得翻身。而那些奸臣、贪官、为富不仁、怙恶不悛的人即使能逍遥法外，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并且比人间的刑罚更加严酷，人间只有打板子、上夹棍、砍头，最厉害的才是千刀万剐（凌迟），最终不过一死，而阴间会有十八层地狱，钉板、刀山、火海，只要想得出的刑具刑罚应有尽有，而且能一遍遍地用，死了再死。实在不够，让你转世为牛马，再来一个轮回。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大家都了解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燕京大学上本科时，曾选修历史系一位外籍教授开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一课程。他的教法是把清朝末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以后到辛亥革命期间，他看到的外国作者对中国人的事情和说法的英文材料让我们阅读，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变化。对这门课我是很用功的，他指定的书和文章我都读了，而且记录下来。所读的材料，历时约50年，经过四个皇帝，进犯的国家从老牌的英、法、俄开始，逐渐增加到12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有十多个之多。这段时间里还有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至今仍然记得。那就是在太平天国宣布起义并定都南京后，有一位曾国藩手下的大将，名叫胡林翼，当时驻守在今安徽的马鞍山，他在阅兵时，有一只外国军舰，冲着他沿江而上，这位大将竟当场昏厥了过去。以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对付太平天国我们还有把握，但对付这些外国军舰就没有办法了。此事生动的反映了当时清政府上层的态度。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物质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惧怕和退缩了。从而引起了以后丧权辱国的灾难性后果。

这说明在中西文化碰头时，他们认输了。这是一个大转折。过去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使节为“外夷入觐”，乾隆皇帝认为自己国家物产丰盈，并不需要“外夷”的货物，和他们贸易只是一种恩赐。英国使团提出觐见时，曾要求英使节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个皇帝这时还没有认输。

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上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已有了“西学”的观念，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以求有所改进，可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概括。人们对中国原有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到了“五四”运动，碰到的问题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学”可以解决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了。所以“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不少人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作为推翻和取代传统制度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与科学，在“五四”之后发生过“科学和玄学”及“民主与独裁”的两次重要争辩。随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问题了。抗战开始，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使争论暂时停顿下来，但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仍然是知识界关心的主题。彻底打破现状，重建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无疑对于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那时主导的思潮是肯定传统的，当时即使有人提醒人们应正视革新和传统的关系，也并不能引人注目。抗战结束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情况也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

化而迅速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知识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归结起来看，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了。

总之，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求中国文化的道路。由此涌现出各种流派，新儒家就是重要的一家，它主要在哲学一门之内，也涉及到史学，看法未必一致。这方面我不太熟悉，最近看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讲到：“新儒家”的名是指20世纪的思想流派，其事起于海外，特别指1958年元旦张君劭、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先生在香港《民主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些情况以及其后之发展在我当时的处境自然不会了解，同时也不会是大陆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问题。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开始有所反思，我们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港台的知识界在上世纪60年代也对此提出了问题，不少人感兴趣的是怎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说明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

就我个人来说，我受到的教育是从清末民初所谓新学开始的，这个新的学校制度是针对旧的科举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兴起的。我的父亲是最后一科的秀才，科举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革之后，他被选送到日本去留学，学教育，回来后就搞新学，办了一个中学。我母亲创办了县里第一个蒙养院，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蒙养院里边长大的，所以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我念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学课本，是新学的东西。不用面壁背书、坐冷板凳，还可以唱歌做游戏。初小后进入私人办的私学，也是由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转到燕京，又进了清华研究院，并再去英国留学，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父母主张新学，不要旧的一套，在儿女身上不进行旧式的教育。所以我缺了从小接受国学教育这一段，国学的根子在我身上并不深。中西方文化接触中，在我本人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矛盾。这一点和我的上一代是不同的，他们是受中国文化培养成长的，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由于他们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化的长处有亲切的体验，甚至有归属感。所以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如陈寅恪先生讲“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穆先生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像他们这样的学者是无法接受“进步”和“落后”的简单二分法的，他们求新而不肯弃旧，在当时的潮流中不免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

我在70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预计还有10年的工作时间，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多做些工作。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所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我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这个民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存在的问题是同样的。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

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我回想起在上世纪末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对话，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并且认为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和答复这些问题，譬如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我们交谈时涉及几个实例，一是谈到重视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力一下子解放出来了。以后在农村工业化中，又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同时让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且是不同的东西能不能相容共处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的意义。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三是“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四是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历史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套破坏得太厉害，把这些东西都否定了，我看这是不能否定的，实际上也否定不了。

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的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

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特别在“文革”时期，“传统”被冲刷得太厉害了，由此所造成的危害及其严重性还没有被人们所真正认识，同时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还没有形成，因此我深深感到知识界的责任重大。我前面谈到由于自知国学根底不深，需要补课，近年来读了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先生的著作，很有收获。启发我们对中国文化精神更深入的理解，对中西文化比较作更深刻的研究。

同时自己感觉到对世界大潮流有些“隔膜”，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已经重新“放眼看世界”，我也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但开始看到的主要是西方在新技术方面的迅速发展，有如我在《访美掠影》一书中描述的计算机信息技术等。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舆论“自鸣得意”，我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有批判，但对于中西文化中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敏感。正如我前面所讲自己力争紧跟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行行重行行”，提出“文化自觉”看法，也是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中看到的。

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事件后事态的发展使我很失望，这种“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我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促使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

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

去年5月我在南京大学建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的讲话，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我们这些人，从生物基础上看是和其它动物一样的，人的生命实际上同样有一定的限期，即所谓有生必有死，生和死两端之间是他的生命期。但由于人们聚群而居，在群体中又凭其共同认识相互模仿别人的生活手段以维持他的生命，这时人们已从生物人变成了社会人。每个生物人都在幼年逐步变成社会人而继续生活下去。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生物人生命才能得以绵延直至死亡。我们一般说人的生命是指生物人而言的，一般所说人的生活是指社会人的一生而言的。生活维持生命的继续，从生到死是一个生物必经的过程。但是生活却是从生物机体遗传下来的机能通过有向别人学习的能力而得到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从哺乳到死亡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从同一群体的别人那里学习得来的。所学会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和所利用的器具都是在他学习之前就已经固定和存在的。这一切是由同群人所提供的。这一切统统包括在我所说的人文世界之内。它们是具体的文化内容。当一个生物人离开母体后，就开始在社会中依靠着前人创造的人文世界获得生活。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场合。这个人文世界应当说是和人之初并存的，而且是历代社会人共同的集体创作，社会人一点一滴地在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从互相学习中成为群体公有的生活依靠、公共的资产。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就是指模仿别人而不断实践。这是人从作为生物个体变成社会成员的过程。

人文世界拆开来看，每一个成分都是社会中的个人凭其天生的资质创造出来的，日积月累，一代代人在与自然打交道中形成的。这些创新一旦为群体所接受，就进入人文世界的内涵，不再属于任何的个体了。这就是我们应当深入理解的文化社会性。文化是人为的，但这里只指文化原件的初创阶段，它依靠被吸收在群体中的人们共同接受在群体中维持下去。一群社会人相互学习利用那些人文世界的设施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或说包括它的硬件和软件，进行生活。因而群体中个别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关，但属于社会人的生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却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参差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体生死的定律，而有其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历史性。强调重新更深入地认识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已注意到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东西文化的差别，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出发点上和西方文化就有分歧。前一辈的学者，所谓新儒家，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用历史学的方法，做了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工作，钻研得很深，提出了他们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现在能够做这件事的学者队伍还需要培养，从现在起在几十年里边培养这样一批人是一件当前很重要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要在我们的知识界造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补上“放眼世界”这一课，关注世界大潮流的发展变化。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后文化接触中的大波动必然会到来，迟早要发生的，我们要有准备地迎接这场世界性文化大论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学生工作部（处）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协会

主编：韦彪

编辑：熊冕、李炜、金晶

审核：周涛

顾问：牛翔宇